

## 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

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

蔡 祝 青<sup>\*</sup>

摘 要

本文擬透過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的編纂與流通來描繪學科新名詞朝向標準化、規範化的大致走向，並在此基礎上探索“literature”詞條的現代化進程。約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因上海等租界興起的學習英語熱，使得英華／華英辭典的編纂已從傳教士慢慢轉由知識分子主導的趨勢。藉由三類重要英華辭書的考察（編譯者分別為傳教士、日本知識分子及中國知識分子），我們可看到十九世紀以來馬禮遜（R. Morrison）、羅存德（W. Lobscheid）等傳教士的影響。至1908年由顏惠慶主編，轉譯自英國納韜耳善本（*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則使英華辭書的編譯提升至專業辭典編纂家的視野。這本匯集英、美、日、中等辭書與教科書的群書總匯，堪稱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標準辭典」，不僅為中西「文學」觀念搭起了可匯通之橋樑，也使「文學」等學科新名詞朝向以西學「標準」進行解釋的根本依據。

---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新名詞、文學、馬禮遜、羅存德、納韜耳、顏惠慶、英華大  
辭典

## **The Modernizing Process of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Conception:**

A Study on the Entry “Literature” in the 19<sup>th</sup> and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Tsai Chu-ching

### 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how the 19<sup>th</sup> and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helped standardize and normalize new terminologies of diverse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focuses in particular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entry word “literature.” During the Shanghai Settlement in 1860s, the hunger to learn English began to spread, and as a result, the general public’s craving for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increased. Because of this, native Chinese literati gradually took over from foreign missionaries the work of compiling dictionaries to better meet Chinese users’ needs. After examining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compiled by missionaries, Japan literati, and China literati, the influence of Morrison and Lobscheid’s dictionaries is obvious. In 1908, *An English-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which was translated from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iled by Yen Hui-ching was published. It wasn't 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dictionary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reached a more professional standard. *An English-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which was compiled from English, American, Japanese,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textbooks, hence has given terminologies of diverse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the word “literature” a more western “standard” definition.

Keywords: new term, literature, Robert Morrison, Wilhelm Lobscheid, P. Austin Nuttall, Yen Hui-ching (W. W. Ye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 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

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

蔡 祝 青

### 一、前言

十九、二十世紀透過西方帝國主義的拓展，使得帝國文化以一種泛世界的普遍價值進入了全球的文化場域，非歐洲世界一方面藉由對外反抗，慢慢建立起了自我的民族認同，並進一步追求民族自決與獨立；二方面則在帝國強勢的壓迫下，對內主動或被迫接受了帝國文

---

\* 本文曾以三篇會議論文的形式發表，分別為蔡祝青：〈學科新名詞的標準化歷程：以晚清《英漢辭典》的編纂為中心〉，「百年思索：揮別、延續、創新」第三十四屆比較文學學會年會（南投：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2011年5月21-22日）；蔡祝青：〈學科新名詞的標準化歷程：以晚清《英漢辭典》編纂「文學」觀念為中心〉，「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2011年11月18-20日）；蔡祝青：〈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從晚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年11月1-2日）。感謝講評人張堂錡、袁進教授及與會學者瓦格納、葉凱蒂、黃美娥、李歐梵、李爽學、彭小妍、王瓊玲等教授高見，又得維多利亞讀書會學友們的腦力激盪，俾使拙作可不斷擴充並完善；另在「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12年6月1日）再得日本關西大學內田慶市教授、沈國威教授，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之啟發；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化的啓蒙論述，並將「現代化」的追求落實爲自我改造運動，用以積累對抗帝國主義的資本，並逐步成就了「殖民的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在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過程中，也無法逃脫帝國主義與現代化帶來的兩大影響，據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與劉廣京（1921-2006）的研究指出，中國自「1890年代，經過多次災難之後，進化的觀念和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偷偷進入儒家學說，作爲革命運動的綱領。最後，改革分子的主要奮鬥目標，不是直接對抗帝國主義，而是對抗使帝國主義得到發展的中國傳統。」因此，「晚清對西方的回應，現在看來似乎只是次要的動機，主要過程仍在於中國在新的環境中（包括西方）不斷對中國的傳統加以調整」；<sup>1</sup> 其次，在「現代化」的追求方面，主要奠基於來自近代西方所發展的一切社會科學的觀念。尤其，這些現代化的概念在帝國文化的龐大勢力支持下，已然形成了高層次的通則，它們先透過各領域、各學科的「新名詞」予以界定，並逐一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中慢慢醞釀發酵，在一個「優勝劣敗」的價值判準下，使得傳統文化在這場與帝國文化的競爭中節節敗退與讓步，最終，在詞與物的連結確立之後，「新名詞」進一步成爲新思想的工具，並主導新文化的走向。<sup>2</sup> 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們已可見到從「天下」、「萬國」進一步朝向「世界」觀發展的典型範例，此中也蘊含著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論述；在知識體系的發展面向上，則可見從「格物」朝向「科學」發展的遞嬗軌跡；<sup>3</sup> 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與隨之而來學部的設立，則清楚標誌著中國教育體系朝向現代化發展的趨勢。<sup>4</sup> 本文將嘗試在此文化脈

<sup>1</sup> 費正清、劉廣京：〈第十一冊序言〉，收於費正清、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第11冊，頁xxvi。

<sup>2</sup> 費正清、劉廣京：〈第十一冊序言〉，收於費正清、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第11冊，頁xxv。

<sup>3</sup> 詳參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221-245、319-356。

<sup>4</sup> 關於晚清學部的設立與發展，可參閱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

絡下，探索現代「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

「文學」二字在傳統中國文化語境裡早已蘊含極豐富的文化內涵，可指孔門四科、儒家學說、文章經籍、儒生、習儒之所、文才、學科、官名等意義。<sup>5</sup> 據學者研究指出，現代漢語的研究應該要專注那些可譯性的類型（the type of translatability），這些類型是在十九世紀後，透過漢語、現代日語以及歐洲語言之間複雜的傳播過程而慢慢形成。<sup>6</sup> 其傳播路徑除了由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國的途徑，還有另一條途徑，就是從西洋直接到中國，或者從西洋到中國（但在中國沒有流行開來）再到日本，而後返回中國。<sup>7</sup> 若就「文學」一詞而論，劉禾（Lydia H. Liu, 1933-）將其歸類為「源自傳教士漢語文本的新詞」。<sup>8</sup> 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文學」雖不是一個新名詞，但「文學」二字要等同於英文的“literature”，究竟歷經了什麼樣的歷史進程卻有待詳細梳理，在此，劉禾曾提供了簡略的描述：

可回溯到17世紀耶穌會的譯法（艾儒略，1623）。這一複

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sup>5</sup> 詳參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製作：《漢語大詞典》〔電子資源〕（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中的「文學」條。

<sup>6</sup>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9. 中譯可參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369。

<sup>7</sup> 周振鶴：〈《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在創製漢語新詞方面的作用〉，《詞庫建設通訊》第15期（1998年2月），頁1。

<sup>8</sup> 在劉禾的分類中，將十九世紀以來的現代漢語分為A. 源自傳教士漢語文本的新詞；B. 現代漢語的中—日—歐外來詞；C. 現代漢語的中—日外來詞；D. 回歸的書寫形式外來詞：源自古漢語的日本「漢字」詞語；E. 源自現代日語的後綴前綴複合詞採樣；F. 源自英語、法語、德語的漢語音譯詞；G. 源自俄語的漢語音譯詞。參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頁369-463；「文學」一詞在頁380。其中附錄A的部分主要奠基於（義）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1960-）的研究，詳見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

合詞後來被 19 世紀的新教傳教士使用以翻譯現代英文詞“literature”，並經由日語 *bungaku* 的雙程流傳而播揚甚廣（參見 Masini，p.204）。<sup>9</sup>

關於十七世紀（中國晚明）耶穌會對於「文學」從字面上到實質文本繁複的譯介過程，已有學者持續進行深化的探討，<sup>10</sup> 而十九世紀以降「文學」一詞的譯介發展至少有新教傳教士的翻譯與經由日文 *bungaku*（ぶんがく，「文學」的日文拼音）現代意義的雙程流傳的衍譯過程。本文因時間與篇幅限制，將專注於十九世紀以來現代「文學」概念在華英／華英辭典中等值化、標準化的歷程；「文學」的現代意義在何時產生？又在何時出現由傳統向現代的意義轉移與替換，使得「文學」觀念不證自明地成為指涉西方文學觀念的內涵？關於此問題的探討我們必須放在晚清「新名詞」、「新術語」的發展脈絡下進行考察，而晚清自十九世紀以降慢慢出現的各式雙語辭典的編纂則見證並保留了這段時期多種語言文化彼此交匯、衝擊、甚至鬥爭所留下的痕跡，也促使眾聲喧嘩的語言慢慢朝向標準化、統一化，也就是以西方語言意義為標的的「現代化」發展。因此本文將以英漢辭典作為主要觀察對象。至於「文學」觀念的語用考察，則有待另文探討。

## 二、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的英語學習熱

要著手進行晚清學科新名詞的探索，我們首先將遭遇到要從何處

<sup>9</sup>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頁 380。

<sup>10</sup> 如李爽學為文論及：艾儒略在《西學凡》（1623 年）中所指雖然類於今人所稱的文學，但其用詞卻是「文藝之學」；明末楊廷筠的《代疑續編》（1635 年以前）在介紹西教之次第時所用「文學」二字，實已包括「各種詩文」在內的「文藝之學」；而魏源在《海國圖志》（1843-1852）中所指稱的「文學」實已近乎艾儒略所指的「文藝」內容。詳見李爽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1 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216-228。



開始的困境。每一個新名詞、新概念的誕生理論上都有一個可資溯源的情境可供敘說，然而當這個偶然出現在異文化的概念新詞，從不穩定的狀態歷經使用者自然的篩選與淘汰，挪用、正用或誤解，或以「同義譯名」的形式<sup>11</sup>同時並陳，到最終塵埃落定，某概念新詞被寫定在辭書當中，從最低限度的意義而言，這個新名詞、新概念不僅已進入了階段性的自我意義的完滿自足並封鎖確立的過程（即使這可能是暫時的），同時也標誌著該詞在其歷史情境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本研究中，與其探索晚清新名詞各種紛繁的源起，筆者以爲事先釐清晚清各學科新名詞規範化、標準化的時間點，將有助於掌握新名詞的現代化發展歷程，而雙語辭典無疑是爲新名詞、新概念提供意義落實的重要載體，也是筆者首要探索的文本。

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降，清帝國與國際之間的溝通需求日增，舉凡外交場合的折衝斡旋、商業場合的合作競爭，乃至洋務運動藉由開設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以及教會機構透過墨海會館、美華書館等譯書機構來培訓外語翻譯人才，並積極翻譯西書，以獲取新知；從教會到清廷開辦的新式學堂，無一不需新式教科書來施予新教；中外報紙的流通，海外訊息的編譯，在在需要翻譯人才。而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因租界區的設立，<sup>12</sup>至1860年代已是華洋雜居

<sup>11</sup> 所謂「同義譯名」，是指同樣一個外來概念，被翻譯成多個譯名的同物異名現象。如英語“bank”一詞，起初便有鈔店、鈔商、版克等不同譯名。“president”一詞，就有伯理喜頓、伯理璽天德、伯理天德、總統等不同譯名。詳見馮志偉：〈同義譯名研究芻議〉，《詞庫建設通訊》第16期（1998年5月），頁1。

<sup>12</sup> 「1845年，上海英租界首先建立，1848年它就開始了第一次擴張。1848年，美租界建立。1849年法租界建立。1863年，上海美租界併入英租界，開始叫『洋涇浜北首外人租界』，後改名爲『上海公共租界』。但人們習慣上仍把英美原有的地界稱爲英租界和美租界。這樣，上海租界就形成了一個公共租界和一個法國專管租界的格局，這一格局一直延續至租界最終被收回。」參見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等編：《中國的租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2。

的狀態，「粵東、寧波人在此計工度日者甚眾」，<sup>13</sup> 為外商提供中介服務的買辦，尤其有學習外語的必要，而華民在日常生活中便與外國人、傳教士有近距離的接觸，舉目所見無非洋貨、洋建築，充耳所聞除有中國各地方言、官話，更有多國外語的眾聲喧嘩，而由上海話與英語混雜而成的「洋涇浜英語」<sup>14</sup> 也隨即應運而生，當時法租界便流行唱著這樣一首「洋涇浜山歌」，今日讀來，仍讓人感受到民間吸收轉化外來語言的生動活力：

來是「卡姆」(Come)，去是「个」「Go」，  
廿四銅鈿「特萬體佛」(Twenty-four)。  
是叫「也斯」(yes) 勿叫「糯」(No)，  
如此如此「塞萬恩塞」(So and so)。

「西唐」(Sit down) 是請儂坐，  
烘山芋叫「伯達度」(Potato)。  
紅頭阿三「開潑淘」(keep door)，  
自家兄弟「伯拉茶」(Brother)。

爺要「發茶」(Father) 娘「賣茶」(Mother)。  
丈人阿爸「發茶老」(Father law)。  
腳叫「伏特」(Foot) 鞋叫「休」(Shoe)。  
洋行買辦「康白度」(Compador)。<sup>15</sup>

<sup>13</sup> (清) 葛元煦：《滬遊雜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頁2。

<sup>14</sup> 「洋涇浜原是英法租界間的一條界河，位於今上海延安東路，渡口西向流至今西藏南路。英法租借區設立後，沿著洋涇浜多有商業機構出現從事貿易，因此發展出結合上海話與英語的口頭溝通語言，雖不符合英語語法，卻是當時商業溝通的重要工具，稱『洋涇浜英語』。1912年出版的英文版《上海旅遊指南》便指出：『你千萬不要認為洋涇浜英文的讀音可笑，語法錯誤，但它確實是上海最實用的英文，否則，你一定會鬧出許多笑話。』參見馬長林：《上海的租界》(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93。

<sup>15</sup> 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黨史研究室編寫：《老話上海法租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20。

這是一首以上海話標注英語發音的山歌，主要以口頭商用語言的實用目的為主。除此，上海也慢慢出現教習英語的行館，在洋涇浜一帶（圖一）便出現了各種外語短訓班和夜校，<sup>16</sup> 一股學習英語的熱潮悄然興起。<sup>17</sup>（清）葛元煦（生卒年不詳）在《滬游雜記》（1876）便提及：「上海中外交易，初皆不知英語，非通事不可。近則各行棧皆有一人能說英語，蓋邇年設有英語文字之館，入館者每日講習一時許即止，月奉修金無多，穎悟幼童半載即能通曉。」<sup>18</sup> 經歷了全國上下從外交到商業<sup>19</sup>，從譯書機構、學堂到行館、租界水岸的外語學習與實踐，社會上慢慢有標準化、定型化的雙語辭典之需求。



圖一：1861 年前的英法租界及界河楊涇浜。<sup>20</sup>

<sup>16</sup> 如 1864 年復合洋行內設有大英學堂，1865 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聯合華洋商紳商一起創辦英華書館，開辦第二年便已開設 22 個日班和 20 個夜班。詳見馬長林：《上海的租界》，頁 91-92。

<sup>17</sup> 關於十九世紀下半期上海的英語熱與早期英語讀本及其影響，可參考鄒振環：〈19 世紀下半期上海的「英語熱」與早期英語讀本及其影響〉，收於馬長林主編：《租界裡的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頁 93-106。

<sup>18</sup>（清）葛元煦：《滬游雜記》，頁 60。

<sup>19</sup> 主要以五口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城市為主。

<sup>20</sup>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頁 21。

### 三、英華／華英辭典的編纂： 從傳教士到中日知識分子

「雙語辭典」是匯通兩種語言最直接、最簡便的溝通工具。辭典以特定的編排順序（如以部首、音韻、字母次序、類別等等），為讀者提供最為簡明、可供查閱、各階級等可統一使用的條列式字詞發音、定義與例句說明。晚清以來藉由各式雙語辭典的編纂、出版與流通，已標誌著中外語言逐漸朝向等值化、規範化、與標準化的歷程發展。在兩種語言初次遭逢時，實有賴於熟諳雙語與雙邊文化的辭典編纂者從中使力，嘗試為兩種語言搭起可溝通、交會的橋樑。尤其在西方帝國勢力的政治壓迫下，清廷對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呼聲自洋務運動以來便不曾稍歇，為求在短時間內快速吸收西學新知，使得西書中譯的要求量大增；各機構內程度不一的譯者，幾乎是在學習新外語的同時，便要擔負起翻譯西書以傳播新知的重責大任。因此，以雙語辭典作為自學外語<sup>21</sup>或翻譯西學的工具書，自晚清以來也變得迫切與必須。

論及英華／華英辭典的出版，中國第一部英華／華英辭典是由英國倫敦傳教會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所編纂，該辭典命名為《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於1815年至1823年間由澳門東印度公司出版社（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出版；這是一部以當時新編的《康熙字典》為基礎所編譯的辭典，共分三部六大卷。第一部為《字典》，是依照嘉慶十二年刊刻的《藝文備覽》進行英譯的華英字典；第二部為《五車韻府》，依照南京方言的拉丁文拼音的字母順序編

<sup>21</sup> 曾紀澤便曾在日記中記載（光緒四年九月十七日，即1878年10月12日）：「余能西音，然在湘苦無師友，取英人字典鑽研餘年，事倍功半。又年齒漸長，自憾難記而健忘，一知半解，無可進矣。」詳見曾紀澤：《曾紀澤集》（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309。感謝何立行博士協助提供資料。

排；第三部則爲英漢對照的《英華字典》。<sup>22</sup> 雖說此書出版於澳門，清末在中國內地並未刊刻，但此辭書卻是傳教士第一部以雙語辭典的形式來探索、溝通中英語言與文化的重要橋樑，更是日後傳教士們用以理解中國文化或編纂辭典的重要依據，因此十分值得作爲考察新名詞、新觀念源起的重要標的。

對於晚清第一代的西方傳教士來說，爲了來華傳教，學習中文、翻譯《聖經》與編纂英漢辭典幾乎是三而合一的任務：爲了以中文傳教，傳教士必須學習中國的語文；爲了使中國人瞭解基督宗教的教義，他必須中譯《聖經》或相關使徒行傳內容；也就在學習中文與翻譯的實踐中，他也慢慢累積了編纂「雙語辭典」<sup>23</sup>的資料與匯通雙（多）語的能力，無形中也積累了自身成爲漢學家的基礎。

《英華字典》的編纂目的，旨在爲日後學習中文者（主要是來華傳教士）提供指引。翻閱辭書內容，主要是以漢字或英文單字作爲索引入口，以便介紹中華帝國的文化思想與風土民情，而不對英文單字本身作進一步的詮解與定義，所以還稱不上是英漢「雙解」辭典的形式。茲以第三部《英華字典》爲例，在“DRAMA”的詞條下，馬禮遜以中英文夾敘的方式，共花了三欄多的篇幅，依次說明中國戲曲的起源、戲曲歷代發展簡史，並介紹十種角色、舞台上的設施，以及中國戲曲的十二個主題（十二科）等內涵，實已具備中國戲曲簡史的雛形。茲節錄起始內容以詳大略：

DRAMA. The origin of the drama in China, is attributed to 元宗 Yuen-tsung, an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D. 740; it

<sup>22</sup> 詳見雍和明等：《中國辭典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61；沈國威：《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頁17-46。

<sup>23</sup> 這裡所指的「雙語辭典」有葡漢、英漢、法漢、德漢、義漢、甚至拉漢等辭典；而雙語辭典中的漢語，除了作爲官話的北京話外，也出現不少各地方言，如廣州話、上海話、南京話、寧波話、客家話等，這主要是傳教士爲了便於在當地傳教，必須熟諳當地語言的實用目的。

was then called 傳奇 chuen ke; Sung dynasty called the drama 戲曲 he keūh; the Kin dynasty, 院本雜劇 Yuen pun tsā Keīh. The terms now made use for the several performers originated with the emperor 徽宗 Hwuy-tsung (A.D.1120), who 見鬻國人來朝衣裳舉動可笑使優人效之以為戲 on seeing the persons of an embassy from *Tswan kwě*, whose dress and gestures were laughable; he ordered the musicians to imitate them, and get up a play.<sup>24</sup>

在這則條目中，編者首先認定英文的“DRAMA”就等值於中文的「戲曲」；這是在進行一種雙邊異文化彼此「對等物」的思維，透過「努力找出對應的詞語，完成概念的等值交換」，<sup>25</sup>而不是進入“DRAMA”與「戲曲」實質內涵的比較探討。當然，我們今日已能輕易列舉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表演藝術。再者，編者主要以英文來向讀者說明中國戲曲的發展內涵，並在適時之處加入中文與拼音（南京方言），同時進行英文的同義翻譯；編者所引中文典故資料也極具深度，絕非泛泛之論。<sup>26</sup>因此，在此書完成後，不僅為馬禮遜贏得了神學博士學位，<sup>27</sup>更為日後入華傳教士學習中華語言與文化以傳教、編纂辭書、翻譯聖典等方面奠定極紮實的基礎。後繼者在此基礎上沿用並增補者不少，諸如：於1844年出版的〔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所編譯的《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於1847-1848年由〔英〕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所編纂的《英漢

<sup>24</sup>（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著，張西平主編：《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6，頁129。

<sup>25</sup>沈國威：《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11。

<sup>26</sup>如在《華英字典》第一卷的部分，「學」字下便有長達39頁的說明，這其中佔最長篇幅的，就是關於中國科舉制度的詳細介紹。詳見（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著，張西平主編：《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卷1，頁746-785。

<sup>27</sup>顧長聲：《馬禮遜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頁78。

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至1866-1869年由〔德〕羅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所編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出版,則代表了「19世紀西人漢外辭典編纂的最高成就,對漢語、日本的近代英日辭典的編纂、譯詞的形成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sup>28</sup>直到1916年由〔德〕赫美玲(K. Hermeling, 1878-1925)所編輯的《標準中國官話英華辭典》<sup>29</sup>(*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ion*)出版,則已是「西人漢外辭典編纂一個世紀努力的尾聲」,其編纂方針「主要著眼於外國人將英語譯成漢語時的需要,但也可以爲閱讀英文書的中國人提供幫助。」<sup>30</sup>

由傳教士主編的辭典,已不可避免地以自我身分與文化爲本位,進行有利於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參考,這樣的英華辭典對於想要學習英文與英國風土文化的中國人而言,畢竟有所缺憾。直至羅存德所編的《英華字典》出,才關注到兩種語言的學習者強烈的需求;除了注重在漢語辭彙中大量增加的新詞,也希望給當時在英語中新興的大量術語進行翻譯與解釋。<sup>31</sup>此外,也慢慢有海外留學經驗、親受過英語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嘗試編輯符合國人使用的英華／華英字典,這是一個從編輯仿效、借鑒成形,和獨立研究編纂的發展歷程。<sup>32</sup>

最早由中國知識分子編輯而成的英華／華英字典,是1868年由鄭其照所編的《字典集成》(*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 Compiled in Part from Those of Morrison, Medhurst and Williams*)。鄭其照(1836,

<sup>28</sup> 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97。

<sup>29</sup> 中文爲筆者所譯。

<sup>30</sup> 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32-433。

<sup>31</sup> 詳羅存德：《〈英華字典〉Part I序言》，收於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90。

<sup>32</sup> 雍和明等：《中國辭典史論》，頁450。

一說 1844-?)，字容階，初名全福，廣東省新寧縣人。1874 年曾在上海留美幼童預備學校教授英語，更於 1874、1875 年護送第三、四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國，並擔任美國漢語辭書委員會的秘書兼翻譯。<sup>33</sup> 鄭曾編寫英語教科書與辭書多種，<sup>34</sup> 而 1868 年出版的《字典集成》即是一部彙編馬禮遜、麥都思、衛三畏等人著作，<sup>35</sup> 收錄 8000 字左右的小型英漢字典，<sup>36</sup> 出版地在香港；至 1875 年，鄭氏「復將其書精究而詳輯之，凡日用稱名之字及往來酬應之文幾於備載」，<sup>37</sup> 於是有《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from Different Authors, and Enlarg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Last Four Parts*) 第二版的出版，出版地仍在香港。待鄭其照留在美國工作後，又對該辭書進行增訂修改，而有 1887 年《華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the Latest and Best Authorities, and Containing All Words in Use, with Many Examples of These Use*) 第三版的出版，之後並有多次再版。此版不僅增加了辭彙、短語和各種雜詞，同時也增加了解釋

<sup>33</sup> 沈國威：《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 117。

<sup>34</sup> 如 1868 年的《字典集成》、1881 年的《英文成語字典》與《英語彙腋》三集等。鄭其照的生平年譜可參見（日）內田慶市：〈鄭其照の玄孫からのメール〉，《或問》第 19 號（2010 年 12 月），頁 134-145。相關研究可參見（日）高田時雄：〈清末の英語學——鄭其照とその著作〉，《東方學》第 117 輯（2009 年 1 月），頁 1-19；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 111-151；鄒振環：〈晚清翻譯出版史上的鄭其照〉，《東方翻譯》2011 年第 5 期，頁 2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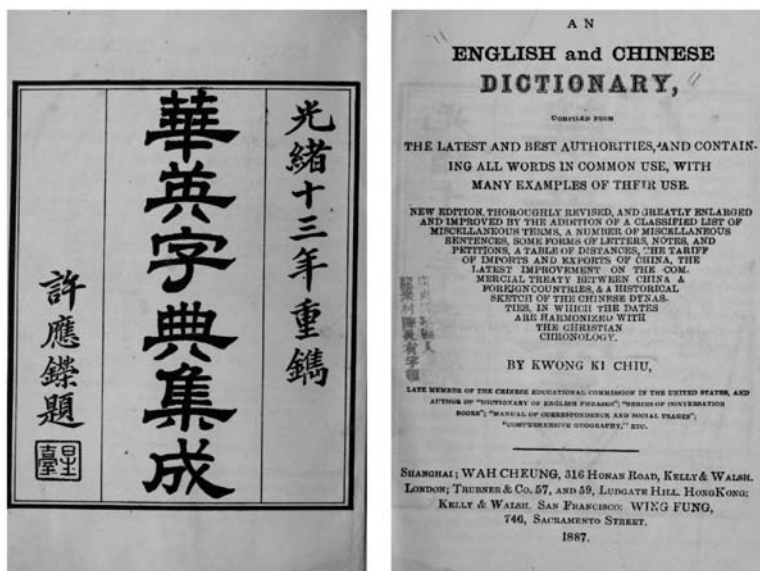
<sup>35</sup> 據內田慶市所做「鄭其照年譜簡編（初稿）」記載，《字典集成》明顯是 *The Irish First Book of Lessons* 的漢語譯本，是愛爾蘭國民系列教科書中的第一本。詳見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 120。但據司佳考查 1836 年出版的一種 *The Irish First Book of Lessons* 發現並無相似痕跡。詳見司佳：〈鄭其照與 1868 年《字典集成》初版〉，收於《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2012 年），頁 303，注 3。

<sup>36</sup> 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 114。

<sup>37</sup> 鄭其照：〈《字典集成》第 2 版序言〉，收於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 112。



定義、同義詞。由筆者所見第三版<sup>38</sup>看來，此書在1882年11月24日序言下雖標注由香港「循環日報承印」，但英文封面卻標記於1887年分別由上海、倫敦、香港、美國舊金山等四地出版，<sup>39</sup>（圖二）可見此辭書之出版通路已不僅在中國上海、英殖民地香港兩地的別發洋行（Kelly & Walsh），更遠至英國倫敦，並擴及留美幼童入境美國的口岸舊金山，<sup>40</sup>隱然已展現亞、歐、美三洲的知識傳播管道。



圖二：鄭其照編：《華英字典集成》第三版，1887年。

- <sup>38</sup> 筆者所見版本乃自 Open Library 網站所得之數位檔案。網址：<http://www.archive.org/stream/englishchinesedi00kwon#page/n13/mode/2up>，檢索日期：2012年8月20日。
- <sup>39</sup> 此四家出版社分別為：Shanghai: Kelly & Walsh（別發洋行）、London: Trubner & Co. 57, and 59, Ludgate Hill、HongKong: Kelly & Walsh（別發洋行）、San Francisco: Wing Fung, 746, Sacramento Street。
- <sup>40</sup> 清廷於1872年到1875年間，曾聽從容闈的建議，先後派遣四批共一百二十位學生出洋遊學。從《大清留美幼童》（北京：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出版年不詳）第二集紀錄片中，可知大清留美幼童前往美國的路線是先從上海出發，跨越太平洋，在美國舊金山登陸，再乘坐貫穿北美大陸的蒸汽火車前往新英格蘭地區。日後，中國留學事務局大樓在康州首府哈

至1899年則有顏惠慶和黃佐臨在《華英字典集成》的基礎上編纂《商務印書館華英字典》(*Commercial Press'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此辭典收詞四萬，顏已自負稱道「雅蒙學界欽崇，幾於人置一函，私爲枕秘」。<sup>41</sup> 商務印書館本以出版英文教科書起家，今見英漢辭典有廣大市場，故於1901年另邀謝洪賚(1873-1916)<sup>42</sup> 編譯，由企英譯書館編校而成《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圖三)。嚴復在序言中便提及：「字典者，羣書之總匯，而亦治語言文字者之權輿也。」然前如《五車韻府》等書，「則大抵教會所編輯，取便西人之學中國文字者耳。即至晚出數種，雖較前爲富，然於一字數義，至夫名物動作區別形況之異用，皆緼而不分，學者叩其所不知，而黜闇愈甚，用以逐譯，則事義違反，鼠璞相質，往往多可笑者。」因此常勗勉子弟多用西文字典，不得以華文字典之譯義，望文駢疊爲之。今商務印書館「知時用之所缺，乃延中西淹通之士，即彼中善本，如納韜耳、羅存德、韋柏士特諸家之著，薈萃綴譯，以爲是編。雖未謂即臻於精極，要亦不封於故，而知進於時之所宜者矣。」<sup>43</sup> 可知嚴復所注意到的一字數義與詞性區別等需求，商務書館即將借助優秀的西文字典予以改善。此時編者已依據英國納韜耳辭

特福德(Hartford)落成，二十多名幼童亦進入耶魯大學學習。而鄭其照既然負責護送第三、四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國，並留下來參與當地事務，可知鄭氏正是藉此經歷拓展了其辭書的出版通路，讓《華英字典集成》有機會在舊金山出版。書面資料可參見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5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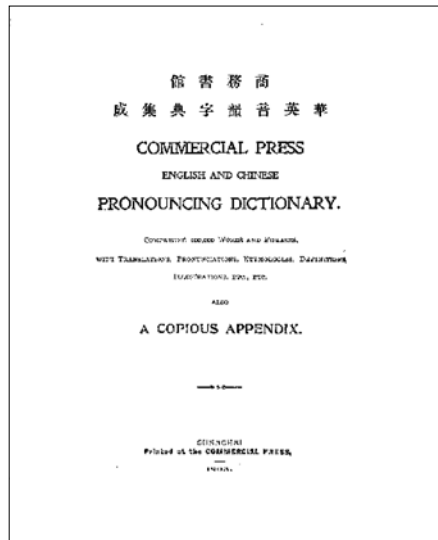
<sup>41</sup> 顏惠慶：〈英華大辭典序〉，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

<sup>42</sup> 謝洪賚，浙江紹興人，寧甯侯，號寄塵。蘇州博習書院(東吳大學前身)畢業。1895年隨院長潘慎文(Alvin Pieson Parker)至中西書院任教，是中國少數翻譯家之一。參見汪家燊：〈商務印書館英語辭書出版簡史〉，收於陳應年、陳江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664。

<sup>43</sup> 嚴復：〈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序〉，收於《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第2版)；《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9年)，卷10。

典（*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與羅存德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進行編纂，其廣告詞稱：

共集字語十餘萬言，注以發音，標其讀法，繼以英字注釋，華字譯義，並綴文法、字類，音韻以英儒納韜耳本為宗，譯義以英國羅布存德本為主，並加增訂。附圖千有餘幅，異物奇器一覽便明，末附英國假借他國俗語解義、減筆字解、記號彙釋及中西地名表。全書一千九百十四葉，鴻博精密，昔所未有。侯官嚴先生謂為獨出冠時，世所寶貴，非過譽也。<sup>44</sup>



圖三：謝洪賚編校：《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第2版，1903年。

<sup>44</sup> 詳見《東方雜誌》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廣告，收於王雲五主持：《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6年）。

這種以華人為學習主體，依據外人所編辭典，標注英字注釋，漢字譯義，也慢慢將英語所蘊含的西土民情翻譯進來的英華／華英字典，才有可能進一步向華人譯介西方現代化的內涵。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編輯原則是「音韻以英儒納韜耳本為宗，譯義以英國羅布存德本為主，並加增訂。」我們若略加考察兩本辭典的來龍去脈，便可知兩辭書正是當時流傳於英美、香港、日本甚至中國等地的兩部重要辭典。

納韜耳辭典原名為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今可譯為《納韜耳氏英語標準辭典》，由納韜耳 (P. Austin Nuttall, ? -1869)<sup>45</sup> 主編，在扉頁及序文中皆宣稱此書乃「集結了當代最卓越的辭典編纂家們的努力」(Based on the labours of the most eminent lexicographers) (圖四)；此書初版於 1886 年，並在短時間內不斷再版，於英美日等國皆有流傳版本。<sup>46</sup> 另在原版前言中，編者對於辭典之所以題名為「標準辭典」也自有一番期許，他「希望已

<sup>45</sup> 納韜耳 (P. Austin Nuttall, ? -1869)，生平資料不詳，若從 Open Library 進行作者搜尋，可見納韜耳所編辭書九種，如 *The Standard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856)、*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Terms* (London: Strahan & Co., Publishers, 1869) 等。在後冊封面所提供的訊息裡，可知作者為法學博士 (LL.D.)，並編有不少教育類的作品。參見 Open Library，網址：<http://www.archive.org/stream/dictionaryscien00nuttgoog#page/n4/mode/2up>，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18 日。

<sup>46</sup> 筆者未見該辭書的紙本，此處所引乃 Open Library 所提供的 PDF 版本，但已是 1914 年由 James Wood 修訂擴編的版本。詳細書目資料為：P. Austin Nuttall ed.,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86*, Rev. James Wood (London, New York: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914)。參見 Open Library，網址：<http://ia700305.us.archive.org/19/items/nuttallsstandar d00nuttrich/nuttallsstandar>，檢索日期：2011 年 9 月 4 日。據此書前言稱，此書於 1886 年初版後，曾於 1890 年、1891 年、以及 1893 年再版，筆者所見網路上所收版本已是 1914 年的修訂版。另據筆者調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亦有一館藏，但此書已是由 James Wood 牧師修訂，日本東京 Z. P. Maruya 公司於 1901 年出版的修訂本，可知此書自出版以來，短期間不僅在英美本土不斷再版流傳，亦曾遠播到日本流通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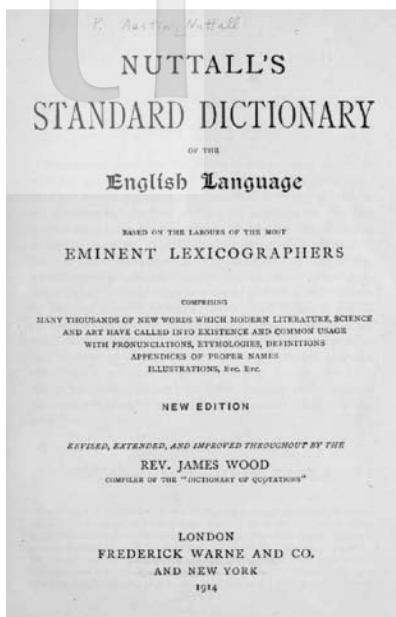
成功地公平對待辭典中的三要素——拼字、發音與定義——如此，此書才配得上以『標準辭典』（“STANDARD DICTIONARY”）作其標題。」<sup>47</sup> 而所謂「標準」的意義，在前文中亦特別標舉：「發音的標準並非任何辭典或任何語音學者的權威，而是當今具有學問與良好教養的社群的發音（the present usage of literary and well-bred society）。」文中論及「倫敦是有關英語學問（English literature）<sup>48</sup> 最重要的大都會，比起任何城市，它在訂定規則以及有關風格與發音方面，對於數以萬計的說寫英文人口而言，都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因此，英語語音學者很自然地會將倫敦最優秀社群的用法做為他們最安全的標準。雖然，還是有許多字沒有固定的一致性。」<sup>49</sup> 由此可知，《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音韻以納韜耳本為宗，可說直接採用了以倫敦「最優秀社群」為尚的發音標準。

---

<sup>47</sup> P. Austin Nuttall, “Preface to the Original Edition,” in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ev. James Wood, viii. 中文為筆者所譯。

<sup>48</sup> 這裡的“English literature”所指並非狹隘的「英語文學」的意義，而是廣義的包含所有關於英語的文字或學問的總和，可參下文關於“literature”詞條的定義及討論。

<sup>49</sup> P. Austin Nuttall, “Preface to the Original Edition,” in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ev. James Wood, ix. 中文為筆者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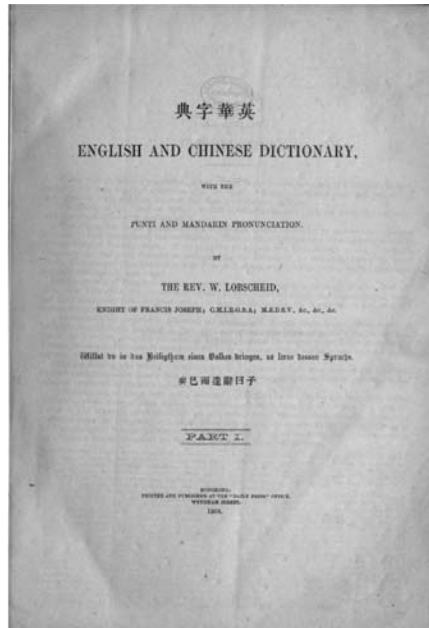


圖四：英國納翰耳辭典善本。

另在譯義方面，則是以羅存德<sup>50</sup>所編寫的《英華字典》為準則（圖五）。該書在1866-1869年香港出版，於前言中，羅存德已清楚意識到字典只要一出版就嫌過時，因中外關係又已向前跨越一大步。尤其西方科技、新事物不斷地取代著中國的舊傳統，在蒸氣、瓦斯、火車之後，大家都在期待著下一個新發明。而「上述的這些進步已經興起了以中文字彙來大量介紹的需求，……（因此）在這部作品中，作

<sup>50</sup>（德）羅存德初為禮賢會（Rheinische Mission Gesellschat）傳教士，1848年至香港傳教，於1850年返國治病。1853年又以福漢會的傳教士身分至香港傳教，直至1857年結束。1856年，羅成為倫敦會的會員，1857年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香港政府的視學官，與理雅各（J. Legge）共同參與香港的教育行政。並於1864年著手編纂《英華字典》，可惜在1869年字典完成前夕，羅與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對立，被褫奪神權，於同年9月黯然回國，出版社受命刪去羅氏字典的三個序言，字典的銷售似乎也受到影響。羅存德生平之考證詳見那須雅之所做之調查。收於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英辭典解題》，頁99-100。

者已將翻譯和解釋視為無可避免，所有這些在本世紀已加進英國語文的學術生詞，它們是爲了標記那些迄今已極爲豐富的人文和科學新發現的術語。」<sup>51</sup> 正因抱持著這樣的理念，羅存德所編成的《英華字典》「其中俚語、文言無不悉載，前人所畧者詳之，不厭其繁；所贅者刪之，不嫌其簡；訪諮至於邇言，搜羅不遺俗字，重抽舊緒，別出新詮，博採旁稽，合參互證，務使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由是學者循途索軌，有所適從，則於西學大有裨焉。」<sup>52</sup> 正因爲羅存德重視學術新詞的翻譯和解釋，使得《英華字典》成爲中日知識分子爭將譯介或參照的重要底本，也是近代譯詞研究的重要典籍。



圖五：羅存德編：《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封面下載自 Open Library.

<sup>51</sup> W. Lobscheid, “Prefac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Ed. W. Lobscheid (Hongkong: Daily Press, 1866)。中文爲筆者所譯。

<sup>52</sup> 張玉堂：〈序文〉，收於 W. Lobscheid 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然而，我們若慮及羅氏字典本身可能在中國流通不廣，<sup>53</sup> 再比較相關詞條定義的發展來看（詳附錄一），《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在“literature”等相關文學詞條的定義上，似乎更類同於 F. Kingsell 增修的《新增華英字典》，而不是原版的羅氏字典。<sup>54</sup> 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追蹤 F. Kingsell 版的出版實況。

1897 年 F. Kingsell 在〔德〕羅存德《英華字典》、〔日〕井上哲次郎《訂增英華字典》的基礎上編輯了《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在橫濱出版。於 1899 年再版後，又不斷在海內外刊行，至少有十七版以上的增刷。<sup>55</sup> 我們若仔細考察 F. Kingsell 的身分，則可在 1899 年再版的中文封面與扉頁上，看到「南海馮鏡如岳超氏增訂」的標注與照片<sup>56</sup>（圖六），再經進一步細究，則可知真正執行字典之編輯者卻是參與孫中山革命的陳少白！

---

<sup>53</sup> 這是日本學者那須雅之的觀察。詳見注 50。

<sup>54</sup> 限於篇幅，關於此點，筆者當另文討論。

<sup>55</sup> 〔日〕那須雅之：〈第 1 期收錄書解說〉，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8 年），卷 1，卷首。

<sup>56</sup> W. Lobscheid 著，F. Kingsell 增訂：《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Yokohama：Kingsell & Co.，1899 年），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9 年），卷 7-8。





圖六：左：1899年版《新增華英字典》中文封面；右：扉頁：馮鏡如（F. Kingsell）照片。

馮鏡如（1844?-1913），廣東南海人，生於香港。1851年父親因參與太平天國而被捕入獄，馮鏡如、馮紫珊兄弟遂東渡日本，於1878年橫濱外國居留地開設文經商會（Kingsell & Co.），主要從事印刷出版與文具之販售。並且斷髮辮，著西裝，向英國領事請求營業保護，故成為英籍中國人。而自命名為 F. Kingsell 也成為馮氏的生存之道。<sup>57</sup> 馮鏡如於1895年協助孫中山在橫濱組織興中會，並擔任

<sup>57</sup> 詳見馮瑞玉〈馮鏡如『新增華英字典』をめぐって〉的考證，轉引自（日）宮田和子：《英華辭典の總和的研究：十九世紀を中心として》（東京：白帝社，2010年），頁164。此文提及馮的英文名字取名原則為：F取其馮姓的 Fung，Kingsell 則取鏡如的廣東音（即“geng3 jyu4”），但實際比較讀音，鏡如的日文音「きょう じょ」似乎更接近英文“Kingsell”的發音。本文廣東音的標注採「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中「香港語言學學會」的注音系統。網址：<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檢索日期：2012年10月22日。感謝熊蘭祺女士提供網址資料。

會長。<sup>58</sup> 又於 1897 年與鄭汝磐等人創辦日本第一所華文學校——橫濱大同學校，也就在這一年，馮邀請了留在橫濱的革命黨人陳少白（1869-1934）<sup>59</sup> 協助執編《新增華英字典》的工作。在陳少白的口述資料裡便提及：

因那時馮鏡如在橫濱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訂了一張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華字典。但是馮鏡如是一個普通商人，不說他中英文文字的根柢如何，又那裡有功夫編輯什麼書籍？但是合同已訂好，書又編不出來，印刷人日日來催稿，所以纔想到我來，就請譚發到東京來找我替他幫忙。<sup>60</sup>

由此可見馮鏡如受日人委託，簽訂合同，卻完全委由陳少白代為編輯英華辭典的實情。而陳少白一來為了會見橫濱的各界人士以鼓吹革命，二則因為自己生計上的困難，所以同意馮氏邀請，「日間替他消磨了幾點鐘功夫，每個月底得他幾十塊錢，應付我的開銷。」<sup>61</sup> 那時馮氏為了便於編纂，還把陳少白請到店裡食宿，最後，「前後大約費了十個月的功夫，英華字典就脫稿。這稿既係馮鏡如出錢編纂，自然是用馮鏡如的名義出版，出版後銷路還好。」<sup>62</sup>

我們若進一步考察這部《新增華英字典》的再版與銷售情形，

<sup>58</sup> 詳見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頁322。

<sup>59</sup> 陳少白，原名聞韶，又名白，號夔石，後改號少白，廣東新會人。1888年，入美國教會所設之廣州格致書院，次年結識孫中山。1890年入香港西醫書院就讀，後與同學孫中山、尤列、楊鶴麟過從甚密，時人稱為「四大寇」。1895年，加入興中會，並參與香港總會組織之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後與孫中山、鄭士良逃至日本橫濱。彙整自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版（河北：河北人物出版社，2007年），頁1387；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頁1322。

<sup>60</sup>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頁21。

<sup>61</sup>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頁21。

<sup>62</sup>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頁22。

則可在1898年由馮鏡如擔任發行人兼編輯，實由梁啟超擔任主筆的《清議報》廣告中，看到「華英字典出售」的實際情形（詳附錄二）。就刊登頻率言，一百回《清議報》中粗估有七十四則大小「華英字典出售」廣告，已見主事者強力促銷的姿態；另就內容觀察，此廣告在《清議報》第十冊（1899年4月1日）的卷末「告白」欄首登以來，即宣布馮氏《增訂華英字典》「刊入英札指南」仟餘版（可參看圖六之左圖），且「（1897年）舊印已悉數銷楚，今再裝印多本出售」的情形，代售處則主要在橫濱、神戶、香港等三地五家。直到《清議報》第二十二冊（1899年7月28日），廣告不僅移到卷首「目錄」之前的醒目位置，代售處也新增到三地六家。至《清議報》四十五冊（1900年5月19日），廣告詞中不僅提及新版本有「新式裝潢，比前精妙」，代售處尤其增加了中國廣東省城兩地，透過華英字典不斷擴地佈點的發展，可確知馮鏡如印行的《新增華英字典》在中國與東亞各地確實有極好的銷路！我們可透過廣告列表，看到《清議報》五十一冊（1900年7月17日）已出現上海：別發洋行的販售點。隨著上海銷售點的增加，至《清議報》七十冊（1901年2月19日），已經出現了七地十二家的販售處（圖七），馮氏字典的銷售已遠及星加坡、檀香山與舊金山，在中國又佔了五家，尤其「北京路美華書館」與同在此路的商務印書館已成街坊之鄰，既得地利之便，商務印書館同仁藉由購買馮氏發行的《新增華英字典》，進而參考編成《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可能性便成信手拈來，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雖說《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出版已號稱「獨出冠時，世所寶貴」，但還是趕不上民間對於新辭典的需求，到了1905年間，商務印書館再與顏惠慶商議，想再出版一部新的英華辭典，隨著社會上學習英語的人數增多，對於專業工具書的籲求也更加踴躍，於是編者顏惠慶有意將英漢辭典的編纂逐漸朝向「系統術語學」的建立來努力，而有1908年《英華大辭典》的出版。

**華英字典出售** 邊君銳如增訂華英字典加入英札指南合對什餘版皆手目正  
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均臻了如指掌欲從學西學者尤宜家置一編也倘印者已舊磨滅  
復再印多本新式裝璜比前精妙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館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茲將  
代售處列下

廣東省城 雙門底 聖教書樓 十八甫 石經堂  
香 港 文武廟直街 文裕堂書坊 聚文閣書坊  
上 海 財發洋行 二馬路 華洋廣雜貨號 北京路 飛華書館  
橫 濱 丸善書店 文輝印書館  
泉 州 水仙門 德隆號 檳香山 嚴樹韶先生 舊金山 正埠 聚昌榮

圖七：《清議報》第七十冊（1901年2月19日）卷首「目錄」前的「華英字典出售」廣告。

#### 四、借鑑英倫辭典編纂家： 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1908）

1904年清廷曾頒定「文典」制度化的章程，期望透過創辦文典，使中外學術得到匯通之郵，對內亦得以統一外語譯詞與思想，<sup>63</sup>但礙於政治上朝代遞嬗，社稷鼎革之大變動，譯學館的實績十分有限。但當我們回到相應的歷史脈絡，卻可找到真正嘗試使英華譯詞朝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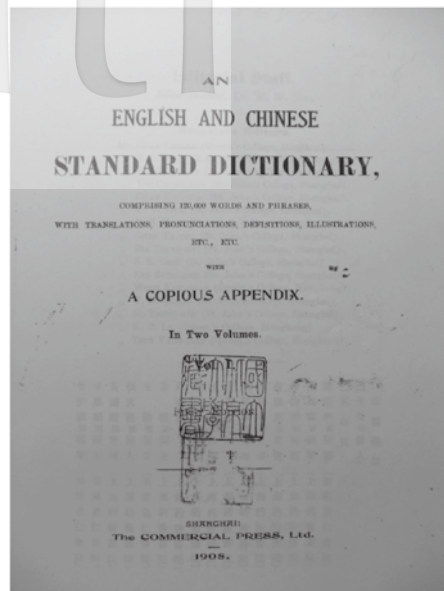
<sup>63</sup> 詳見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譯學館章程》中的「編纂文典章第七」，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永和：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73輯。

標準化發展的落實實踐，顏惠慶於1905年主編的《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便已在英文題名上標舉「英華標準辭典」之名(圖八)。

顏惠慶(Yen Hui-ching 或 W. W. Yen, 1877-1950)，字駿人，上海虹口人。出身於基督教家庭，從父親顏永京一輩開始，顏家子弟便在上海就讀教會學校，進而負笈前往美國留學。顏永京歸國後，曾在上海租界工務局擔任秘書，也曾擔任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sup>64</sup>的學監，後任虹口聖公會救世堂區牧師。有此家庭背景的顏惠慶，接觸英文教育比一般中國子弟還早，曾在英國教會辦的中英學堂就讀，不久又轉到英國人辦的同文書院(Tung Wen College)，到了十八歲前往美國聖公會中學學習，經過了一年半，申請上了弗吉尼亞大學，直到1900年畢業返回上海，則順利進入聖約翰學院任教。至1906年清政府第一次舉行「考驗游學畢業生」的會試，應試者皆爲留學歐美及日本的留學生，顏惠慶報考的專業是哲學，便是由嚴復擔任主考官，試題與答卷皆爲英文，試後放榜，顏惠慶名列第二，因此賜進士出身。<sup>65</sup>由此簡歷可知，顏惠慶至少已承襲了家族兩代接受西方教會學校教育的訓練，加上出國留學的經驗，更兼擔任聖約翰學院教師，對於英文的掌握能力自然高人一等。

<sup>64</sup> 聖約翰學院於1879年由美國聖公會於上海創立，並於1905年升格爲聖約翰大學，是近代在華辦學時間最長，享譽國內外的教會學校。

<sup>65</sup> 顏惠慶生平資料，詳見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58。



圖八：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攝自北京大學圖書館。

1905年，正值顏惠慶任職於聖約翰大學期間，商務印書館邀請他再編撰一部綜合性的辭典以符社會所需。當時擔任聖約翰大學校長的卜舫濟（F. L. Hawks Pott, 1864-1947）便在辭書的序言中言及，「既然辭彙是概念的服飾，謹慎的思考與表達都要求我們必須有精確的辭彙知識」，中國學者既然已不再滿足於自己的學識，也希望吸取西方新知，「在世界學識裡再沒有比英國學識更有價值的了。它擁有足夠廣泛的範圍來包含所有人類思想的主題，諸如宗教、哲學、歷史、科學、生物、旅行、詩歌、小說、經濟等等」，更何況英語是被最多人言說的語言，因此對於閱讀英文書籍的讀者以及翻譯者而言，一本好的辭典工具書將提供最適切的幫助。尤其「新的學問已在中國萌發，但它的成長與傳播仍因缺乏好的科學與哲學的系統命名法而受到阻礙」，唯有一本翻譯精確的辭書可協助達成此目的。<sup>66</sup> 顏惠慶也

<sup>66</sup> F. L. Hawks Pott: "Preface", 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頁 i-ii。此

在編者前言論及，「市面上已有商務印書館的拼音辭典，<sup>67</sup>但伴隨著中國學生學習英文的進展，社會上仍感到需要更大量與更完整的作品。況且，自從出版了拼音辭典，有無數的新術語已經躍然存在，雖說即使到現在，術語學（terminology）的問題仍舊很難圓滿地解決，但許多學術上教科書的出現已經極有幫助地朝向解決之道。因此，一本能夠盡可能容納最多新術語的辭典，將會受到由衷的歡迎。」<sup>68</sup>由此可知，隨著社會上學習英文的進展，社會上不斷有更完善的新辭典之籲求，而教科書與辭典也共同扮演著新術語如何精確詮解的重要角色。顏氏謙稱：「現在的編輯群們並不會宣稱是各學術領域的專家，尤其處在當前術語混亂狀態的中國，任何嘗試標準化的工作對他們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向他們開放的路徑是去請教不同領域中最好的權威，並且採用他們的術語」，<sup>69</sup>以促使理想的辭典以及「科學與哲學的系統命名法」早日在中國實現。

對於這部辭書的性質與編輯上的困難，顏氏也在例言中特別提及：

是編實為羣書總匯，亦一具體而微之百科全書，而繙譯之難，即寓於此，何也？凡泰西所有天文、輿地、諸子百家，暨種種美術，靡不包舉無遺。而我華科學，尚屬幼稚時代，一切名辭，未經審定者強半，微論廣通科學者難其人，即專精英文者亦不多覩，欲成理想粹完之辭典，苦乏理想粹完之譯才，其難者一；科學名辭，譯既不易，而普通字語，更有窮思極想，終乏諦當之說，足與發明者，蓋英文有正用備用，正用者尚易索解，至備用則輾轉相通，茫無涯涘，況又達以華文，恐遺毫釐

---

文原為英文，中文為筆者所譯。

<sup>67</sup> 即謝洪資編譯：《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年）。

<sup>68</sup> F. L. Hawks Pott: “Preface”，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頁 i。中文為筆者所譯。

<sup>69</sup> F. L. Hawks Pott: “Preface”，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頁 ii。中文為筆者所譯。

千里之憾，其難者二。有此二難，因遂商之同志，遍搜舊典，博考羣言，必擇其諦當者而用之，俾無疵類。<sup>70</sup>

在主導編輯這部《英華大辭典》時，顏氏已清楚認知到，這將是一部「群書總匯」、「一具體而微之百科全書」，主要原因在於泰西一切學問已包舉無疑，而中華之新式科學，則仍屬於幼稚時代，在專業術語未經審定的情況下，更兼譯才缺乏、廣通科學新知者有限，雙方要達成詞意溝通實有困難；再者，除專業名詞外，英文更有正用、備用等多種用法，要使兩種語文輾轉相通，更使難處加倍。因此，顏惠慶組織了十六位編輯員參與了實際編輯的工作，由編輯名單看來，主要是十二位上海聖約翰學院以及四位香港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 Hongkong）<sup>71</sup>的畢業生所組成的跨地域編輯團隊，並在兩年間完成編纂。若就內容而言，顏惠慶提及：

是編先議以韋柏士特大辭典<sup>72</sup>為稿本，略譯數紙，殊覺失計，蓋韋書卷帙浩繁，若再增入華文，非數鉅冊數萬葉，不能藏

<sup>70</sup> 詳見顏惠慶：〈例言八則〉，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

<sup>71</sup> 香港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前身為創立於1862年的「中央書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這是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最早設立的男子官立中學（Central School for Boys）。該校自1884年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後於1894年再度更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並沿用至今。該校當時教授算數、文法與通識（General Intelligence）等課程，為十九世紀末期罕見。該校校史詳見網址：<http://www.qc.edu.hk/>，檢索日期：2012年3月12日。

<sup>72</sup> 即韋氏國際辭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韋氏辭典是在美國通用的英文辭典，最早來自辭典編纂家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 1758-1843），他於1828年編出第一部美語字典，成功形塑了美語文化與美國人的身分認同。此處所指則是由耶魯大學的諾亞·波特（Noah Porter）所編纂，分別出版於1864、1879、1884、1890、1898與1900年，1890年版收有175,000個辭彙，1900年版則又增加了25,000條的補遺。筆者所見乃Open Library所提供的線上版本，詳細出版資料為：Noah Porter,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pringfield, Mass: G. & C. Merriam Company, 1898)。網址：<http://archive.org/stream/webstersinternat00port/page/n1/mode/2up>，檢索日期：2012年3月14日。



事。且譯印諸費既需數十萬金，而欲得其書者，非出百餘金，亦難購閱，要非嘉惠學者之初意矣。因遂取英國納韜耳善本改譯，有不備者，再以韋本補入，庶乎輕而易舉。而刪繁就簡，凡所詮釋，條分縷析，仍多引成語，以相證明，俾不致有所疏漏。則簡而不流於苟簡，所謂斟酌盡善蓋如此。<sup>73</sup>

可知顏惠慶本欲以美國的韋氏辭典為稿本，後因卷帙浩繁，恐將耗金費時，更兼無法嘉惠學者購閱使用，因而改採英國的納韜耳善本改譯，有不備者，再以韋本補入。如前文所論，《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音韻已經採用納韜耳本的原則，也就是以倫敦最優秀階層所使用的發音作為標準，《英華大辭典》更在此基礎上，添加字意（definition）的內涵，也就是照錄納韜耳本的定義，並加中文釋義（詳附錄與第四節討論）。顏氏聲稱要使編輯群們「去請教不同領域中最好的權威，並且採用他們的術語」，<sup>74</sup>藉此，《英華大辭典》確實是找到了最便捷的途徑，因為納韜耳善本在封面上便已傲人地宣稱「集結了當代最卓越的辭典編纂家們的努力」，是一部同時看重辭典三要素的「標準辭典」，而今透過顏惠慶所組織的編輯團隊，也將英帝國所主宰的知識體系——納韜耳氏的英語標準辭典——透過改譯的形式引進晚清中國。

《英華大辭典》除了翻譯匯入英美兩大體系的重要辭書，更廣泛參考各類書籍，「不下數十百種，有為中國教育會本者，有為江南製造局本者，有為嚴氏所著本者，有為英和字典本者」，<sup>75</sup>還有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等等，堪稱「集華英諸合璧之大成也」，嚴復尤讚其「蒐輯侈富，無美不收，持較舊作，猶海視河」。<sup>76</sup>該辭書於1908年由商

<sup>73</sup> 顏惠慶：〈例言八則〉，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

<sup>74</sup> F. L. Hawks Pott: “Preface”，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頁 ii。中文為筆者所譯。

<sup>75</sup> 顏惠慶：〈例言八則〉，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

<sup>76</sup> 嚴復：〈序文〉，收於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卷首。

務印書館出版，前有嚴復（中文）、卜舫濟（英文）、顏惠慶（英文、中文）之序言以及〈例言八則〉等說明文字，共鑄成洋裝布面兩大巨冊。出版之後，果然流通甚廣，極受市場歡迎，不僅使後來編纂辭典者參考使用（如德國傳教士赫美玲（K. Hemeling）所編《標準中國官話英漢辭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就將此書列為第一本參考書），到了1920年10月更有小字本以單行冊出版，短短不到一年，至1921年8月已再版到第四版，<sup>77</sup>可知該書流行之大略。

我們若略加檢視《英華大辭典》的實績，可說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顏惠慶所主編的《英華大辭典》已藉由參考英、美、日、中等辭書與教科書的實踐成果，慢慢朝向「品彙中外音名，會通中外詞意」的理想境界，此辭書不僅廣蒐眾書之長以補其短，並將外國文字諸多定義一一羅列，以免專斷；對於專科學術名詞，也竭盡所能去請教各領域專家，以求妥切，允稱當時匯通英華語言之典範之作，並為學習外語之學子、翻譯者、辭典編譯者立下良好的基礎。

## 五、近代英華和辭典中「文學」觀念的演變

在本段落中，我們將透過近代重要英華和辭書中“literature”詞條的發展（詳附錄一），一方面展現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的編纂由傳教士到知識分子主導的發展歷程；二方面則藉由英華和辭典的歷時發展，嘗試梳理“literature”、「ぶんがく」、「文學」三條辭彙如何彼此互涉，並朝向等值化發展的現代化歷程。

---

<sup>77</sup> 詳見顏惠慶主編：《（小字本）英華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版權頁。現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 (一) 來華傳教士的影響

自從馬禮遜於1815-1823年出版第一部英華／華英辭典以來，即成為後者遵循與仿效的對象，若就“literature”詞條來進行觀察，亦可看到此中發展的態勢。

### 1. 馬禮遜

在馬禮遜的英華辭典中，“literature”詞條解釋為「學文。Fond of attacking (i. e. studying) ancient literature, 好攻古文。」“literature”所指的「學文」，不僅讓我們回歸《論語·學而第六》所稱：弟子在「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之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修身次第，據朱熹《四書集註》詮解：「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同時，“literature”也指「Fond of attacking ancient literature」，即「好攻古文」的狀態。我們若對照辭書中相關詞條觀察，“literary degrees”所指為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學士。而“literary man”則是指有文墨的人，文人。另“literati”在中國則稱之為儒、讀書人。可見馬禮遜為“literature”所下的中國定義，一方面注意到了以儒家思想與經典為本位的文化傳統，使“literature”成為一種主動積極、持續動態的學習古文過程；二方面也符合“literature”在西方語境中的原始定義，也就是自十四世紀以來所指「透過閱讀所得到的高雅知識」，在相關例證中既可表示「博覽群書」的狀態名詞，有時其意涵也接近於表達物質名詞——「廣為閱讀的書籍」。因此，“a man of literature”或“a man of letters”所指為「博學的人」，<sup>78</sup> 放到中文語境則成為有文墨的人，文人。

馬禮遜對於“literature”的定義，經過麥都思廣為參閱馬禮遜、漢語著作及《拉丁語·漢語字典》手稿之後，使得“literature”的意涵更為擴充，在麥氏的《英漢辭典》中，意為「文字，文墨，字墨；

<sup>78</sup> (英) 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215。

polite do. 文章；ancient do. 裒裒，<sup>79</sup> 古文；learning，學文。」我們可看到作為名詞使用，最為廣義的「文字，文墨，字墨」；也有意為「純文學」的“polite literature”，用來指稱中國傳統的「文章」觀念；再者有“ancient literature”，來泛指繁盛的古文；最後則是延續馬禮遜所稱的「學文」狀態。

馬禮遜字典對於日本明治時期的辭典，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我們可在《明治のことば辞典》的「ぶんがく 文學」<sup>80</sup> 分類中，看到三部辭書（1866-1872 年間）標注“learning”的意義；有十五部辭書（1874-1892 年間）標注「ガクモン」的意義（在日本中世、近世時期，即指「學文」），雖說這十五部著作主要為史地、漢語方面的辭書，<sup>81</sup> 而非英華辭典，但藉此資料也可略探馬氏對日本辭書之影響。另在平文（J. C. Hepburn, 1815-1911）所編譯的《和英語林集成》（1867 年出版，是和英雙語辭典）中，“literature”有三個日文的對等文意，分別為“Gakumon”（學文）；“bun”（文）；“bundō”（文道）。除了「學文」與「文」之外，日文裡還有「文道」（bundō）的意義，在同一本辭書所附的解說言及：「文道，n. Literature, learing……, military science alone, without a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can never be successful.」由其例句「只有武道而沒有文道的話，是永遠不會成功的。」可知在日文的語境中，文道與武道對舉，所指為文學、學藝之道。<sup>82</sup> 另在該辭書「ぶんがく」詞條下（詳附錄一），另有說明曰：「文學，learning to read, pursuing literary stud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lassics.」所指亦不出「學文」的範圍，指學習閱讀、追求文學的學

<sup>79</sup> 讀同：「又又」，亦做「裒裒」。原指衣服華美貌；禾黍茂盛貌。此泛指繁盛貌。

<sup>80</sup> （日）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98 年三版），頁 512-514。感謝彭小妍教授提醒。

<sup>81</sup> 如《萬國史略便覽》、《十八史略譯語》、《萬國史略字引》、《輿地至略誌略字引》、《改正小學讀本字解》等十五本辭書。

<sup>82</sup> 詳參《スーパー大辞林 3.0》解說，收於 SHARP 電子辭書（Papyrus PW-LT220）。

習，尤其是中國的經典古籍。由此可見，上述日文辭書中的詞條，無不在馬禮遜的基礎上續做發揮。而要使“literature”對譯成「文學」者，必須從羅存德的定義開始論起。

## 2. 羅存德

羅存德的《英華字典》出版於1866-1869年，在香港印行。雖說有學者認為羅氏在字典完成前夕，因與China Missionary Conference發生對立，使得羅氏被褫奪神權，黯然返歐，也讓《英華字典》在中國的流通受到影響，<sup>83</sup>但證諸事實，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不論是在明治日本或是晚清中國，都是馬禮遜《字典》之後，最為重要的英漢辭典代表作。我們可從附錄一的列表中，看到中日知識分子在該辭書出版後，三十年間不斷在其基礎上翻譯、訂增、新增、改編的過程，而“literature”詞條的內涵在這段期間逐漸朝向標準化、統一化的現象，也與羅存德的定義有極大的關係。

羅氏《英華字典》的“literature”詞條，定義為「文，文學，文字，字墨；ancient literature，古文，今文。」一來這是上承自麥都思《英漢辭典》中關於「文字、文墨」的廣泛定義；二方面則將馬禮遜所謂「學文」、「好攻古文」的狀態，轉化成名詞「ancient literature，古文」，並進一步延伸至「今文」，可見中國經典古籍已不再是唯一的文學閱讀書目，編者已把當代的「今文」列入其中；尤為重要者，則是羅存德開創以「文學」二字來對譯、解讀“literature”的可能性，這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而關鍵的例證。

關於何人何書最早將“literature”對譯成「文學」的問題，過去曾有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蛭原八郎認為是美國平文先生（J. C. Hepburn，或譯成赫本）編譯的《和英語林集成》（*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千叶宣一則認為是明治十四年刊行，由井上哲

---

<sup>83</sup> 沈國威據（日）那須雅之之研究成果，而做此推論。詳見沈國威：《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100-101。

次郎 (Tetsuziro Inoue, 1855-1944)<sup>84</sup> 等編著的《哲學字彙》(東京：東京大學三學部, 1881年)。<sup>85</sup> 但詳加細究,《和英語林集成》只能說是最早將日文「Bun-Gaku, ブンガク」譯成「文學」的先例,其“literature”詞條下的定義還是“Gakumon; bun; bundō”,即「學文; 文; 文道」,尙無「文學」之譯。而早在《哲學字彙》出版前兩年,就有津田仙等人翻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科教授中村敬字 (Keiu Nakamura, 1832-1891)<sup>86</sup> 校正的《英華和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東京:山內轅出版,吉田橘翁印刷,1879年)出版,此書是第一部將英華和三國語言進行匯通的重要嘗試,其翻譯所本便是羅氏字典。

在《英華和譯字典》中,“literature”詞條所列爲:

n. 文,文學,文字,文墨, ブン, bun, ブンガク, bungaku, モンジ, mon-ji;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 コブン, ko-bun; 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コンブン, kon-bun

由此觀之,《英華和譯字典》的編法是完全照錄羅存德《英華字典》的詞條,再加上日文翻譯,也因此有機會形成了將“literature”、文

<sup>84</sup> (日)井上哲次郎,號巽軒,1884-1890年前往德國學習哲學。爲日本著名哲學家,活躍於明治時期,1890-1923年期間曾擔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sup>85</sup> 詳見(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日本の「文学」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101-133。

<sup>86</sup> (日)中村敬字,名正直,號敬字,是日本的武士、幕臣、與啓蒙思想家。1866年以昌平黌儒官的身分率領十二名學生前往英國留學,1870年翻譯出版《西國勵志篇》(Self Help),1871年出版《自由之理》(On Liberty),1873年與福澤諭吉、森有禮、西周、加藤弘之等人創辦「明六社」,共同致力於啓蒙思想的普及化。1877年於東京帝國大學創立時,中村受聘爲文學科教授。1879年由中村校正的《英華和譯字典》在東京出版。中村敬字在明治日本的重要性,約可與晚清中國的嚴復相比擬。相關討論可參見陳瑋芬:〈西學啓蒙:由中村敬字和嚴復的翻譯事業觀其會通東西的實踐〉,《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卷第1期(2008年6月),頁61-111。

學、ブンガク三者並列等值的最早案例！而此中關鍵，正是原本羅存德《英華字典》居中所起的作用。

在《英華和譯字典》譯介進日本之後，隨後有井上哲次郎（Tetsuziro Inoue, 1855-1944）於1883-1885年《訂增英華字典》在東京出版，並在1899年和1906年兩度再版。1897年又有F. Kingsell（馮鏡如）出版的《新增英華字典》在橫濱等地出版，並於1899年再版增印的情形（詳上節所論）。井上在序言中便言及：「意義既盡，譯意又妥，而最便象胥家者，其唯西儒羅存德氏所著《英華字典》耶。世之修英學者據此書以求意義，則無字不解，無文不曉，左右逢源，何所不通之有。但此書乏坊間而價極貴，學者憾其難得書肆，藤本氏有見于此，乃欲刷行此書以便學者。」<sup>87</sup>可知井上力讚羅氏字典之釋意最便於譯家，盼能訂增刷行以普及於學者。透過日本有識之士不斷爲此書增訂並印行，終使羅氏字典在日本產生極遠大的影響。<sup>88</sup>

羅氏字典的勢力同樣在中國知識分子編纂的英漢辭書中起到主導的作用。中國第一部由知識分子所編纂的英漢辭典——鄭其照所彙編的《字典集成》，前後雖有三種版本的發展，其所本的原本目前學界也各持說法，<sup>89</sup>我們卻不可否認第三版的“literature”詞條所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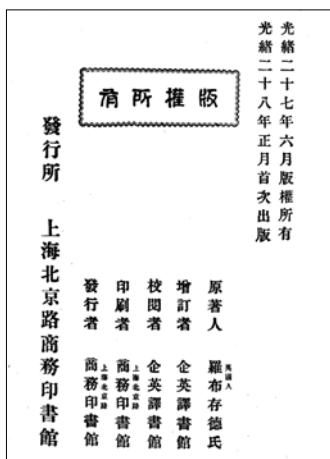
<sup>87</sup>（日）井上哲次郎：〈英華字典敘〉，收於羅布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增訂：《訂增英華字典》（Tokio：J. Fujimoto, 1883年）；《明治期刊行物集成》（東京：雄松堂，1988年）。

<sup>88</sup> 相關討論可參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31。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頁101-102。

<sup>89</sup> 據鄭其照《字典集成》第一版英文封面所示，此書部分乃編輯自馬禮遜、麥都思、衛三畏（Morrison, Medhurst and Williams）的辭書。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頁111；據1897年F. Kingsell所編《新增英華字典》序言所稱「華英字典初自業師羅存德牧師，中國之涉獵西學者久已視爲圭臬。後譚達軒容階諸氏復撮而小之，刊行於世，購之者眾，而原書幾泯□無傳矣。」可知鄭其照曾縮編過羅氏字典。關於第三版的《華英字典集成》，沈國威與內田慶市以爲鄭其照對麥都思與羅存德的字典是「既有借用，又有所創造。」陳力衛則以爲鄭氏字典與麥都思的字典相差甚遠，格式上卻類似衛三畏。詳鄒振環：〈晚清翻譯出版史的鄭其照〉，《東方翻譯》第5期（2011年10月），頁33。

文字，文學，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確實與羅氏字典有著最高度的重合性。<sup>90</sup>

到了1902年《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出版，其版權頁已清楚載明此辭書「原著人：英國人<sup>91</sup>羅布存德氏；增訂者：企英譯書館；校閱者：企英譯書館」（圖九）再由“literature”詞條觀察，則所列「n. 文，文學，文字，文章；ancient literature，古文；modern literature，今文」，已與 F. Kingsell（馮鏡如）於1897年在橫濱出版的《新增英華字典》詞條完全相同（詳附錄一），如第二節所論，《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所根據的原本應該不是羅氏字典的原本，而是馮鏡如的新增版本。可知中日間《英華字典》對於“literature”的詮解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已完成了階段性的統一，而這標準是建立在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之上。



圖九：《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1902年，版權頁。<sup>92</sup>

<sup>90</sup> 筆者未見鄭其照《字典集成》的初版與第二版，關於“literature”詞條在此字典中的發展變化，有待來日再考。

<sup>91</sup> 這裡的標注顯然有誤，羅存德應是德國人。

<sup>92</sup> 《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英文封面印有“Second Edition”字樣，後有版權頁。此為日本九州大學山田文庫所收版本。感謝山口聖智先生協助取得資料。



然而，我們也必須說，雖然這個“literature”詞條已帶出了「文學」的字眼，在儒家古籍之外，也增添了「modern literature，今文」的意涵，但「文，文學，文字，文章」之間的區分與層次還是面目難辨。直到顏惠慶另闢蹊徑，不再執著於羅存德，而轉求英國納韜耳善本，才使“literature”詞條的內涵產生極大的跨越，尤其展現出層次清楚的現代性意涵。

## (二)「文學」概念的現代化趨勢：

### 由廣義到狹義的次第井然

顏惠慶主編的《英華大辭典》主要以英國納韜耳善本爲底本進行改譯，並博採英、美、日、中各家辭書、教科書的精華，所以辭彙的收錄更爲完整，內容次第的安排也愈加豐富，主要採用：「英文單字：音標，詞類說明，英文釋義，中文譯詞（或相應概念）」的形式，每個單字也多有一個以上的定義和內涵。當我們仔細比對翻譯所本的納韜耳善本，更可發現《英華大辭典》的英文定義及解說，有九成以上都是原文照錄納韜耳善本的內容，我們在文學相關辭彙中便可看到豐富的例證，如“comedy”、“drama”、“fictionist”、“literate”、“literati”、“literature”、“narrative”、“novelist”、“poem”、“poet”、“poetic”、“tragedy”等；也有少數單字在納韜耳本的基礎上再加引了羅存德的定義，如“literary”、“poetry”；另有部分解說內容，則錄自《韋氏國際辭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如“fiction”、“literal”、“narration”、“prose”等字；最後，還有少部分內文來源不詳者，如“narrate”、“narrator”、“novel”等等。

以下我們便要進一步觀察“literature”詞條的意涵：

Literature, (lit'-er-á-tewr) n. 1. Acquaintance with books, 學識，學問，淹通，博學；2. The collective body of literary productions of a country or an age, in general or in some special

department, 文, 書, 文章, 文庫, 經史子集; 3. In a special sense, that body of literary compositions which, to the exclusion of merely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s, are occupied mainly with that which is spiritual in its nature and imaginative in its form, whether in the world of fact or the world of fiction, 文學, 文章 (特別意義, 除哲理及科學外, 凡神靈思想為其資料; 離奇變幻為其形式, 或實記或杜撰者, 皆文學也); 4. The profession of letters, 文學業; belles lettres, 文藝。

透過“Literature”詞條的羅列，我們馬上可看出此定義已跳脫了三十多年來羅氏字典中“literature”定義的格局。在此詞條下，名詞用法已分列出四個層次，並且由上而下逐漸縮小其範圍：

第一層可說是最廣義，從英文來解是指「所有書籍的學識」，中文譯解為「學識，學問，淹通，博學」，已能詳盡說明。

第二層意涵為次，用英文來解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在一般或一些特殊部門的寫作作品之總合。」<sup>93</sup>用中文釋義則有「文，書，文章，文庫，經史子集」等項目。其中「文庫」應是來自日文的語彙，<sup>94</sup>在日本近代出版業勃興的明治時期，主要指帝國文庫、日本文庫等叢書或全集的總類名稱。<sup>95</sup>而「文，書，文章，經史子集」則是

<sup>93</sup> 可參閱威廉士之研究：「“literary”的字義被擴大解釋，超越了它的同義字：也許最初的普遍意涵是廣泛閱讀，但是從十八世紀中葉起，指的是寫作的工業與行業。……這似乎是與作家這個行業的高度自我意識有關；這些作家處在一個過渡時期，是從他人資助過渡到市場的書籍銷售。」詳見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216。

<sup>94</sup> 在《漢語大辭典》中並無「文庫」的傳統用法，唯一的例證已是民初的用法，例句為：「剛巧，書店裏也正有這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鄭振鐸《現代創作文庫·序》）在《日中辭書》中則可指：1. 書庫；2. 文卷匣；3. 袖珍文本集；4. (藏書)文庫。詳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商務印書館、小學館共同編輯：《日中辭書》（東京：小學館，2002年），頁1704。

<sup>95</sup> 詳見《ブリタニカ國際大百科事典》《大英百科全書》中「ぶんこ」（文庫）的解釋，收於SHARP電子辭書（Papyrus PW-LT220）。

中國傳統意義下對於寫作作品總和的理解。在這個層次的定義中，中文的「經史子集」已把握住「寫作作品總和」的概念，但英文中已展現的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的寫作作品，隱約中已帶出「國家文學」或「斷代文學」的概念，可惜中譯尚不能明確地表達，但透過如是印刷出版的英文定義，相信對未來能通讀英文的讀者而言，還是具備有現代意義的啓示。

到了第三層次已縮小範圍，而帶出了特別意義的文學意涵，即我們今天所熟稔西方定義下「文學」的內容。從英文來解，可作「就某種特別意涵而言，這些作品已排除掉哲學、科學與技術的作品，它們主要以靈性爲其本質，以想像爲其形式，無論是在真實或虛構的世界。」此涵意已帶出文學的「靈性本質／想像形式」以及「真實／虛構」等現代性的觀念。我們若回溯“literature”在西方的發展，約在十七世紀中葉左右，當“literature”能與其他作品——哲學、散文、歷史等區隔開來，不論這些作品是否具有文學特質或趣味，而使「文學」可被解釋爲「寫得很好」、具有想像力或創意之類的書；更兼“poetry”的意涵被侷限在「具有格律的創作」，伴隨著“prose”的形式（如小說）日趨重要，才使“literature”慢慢取代了“poetry”，而使現代的意義確定。<sup>96</sup>若我們參看中譯，所謂「除哲理及科學外，凡神靈思想爲其資料；離奇變幻爲其形式，或實記或杜撰者，皆文學也。」在此定義下，已將「哲理」排除在外，需知中國傳統歷來是文史哲合一的；而「文學」與「科學」的分立卻正是西方區別「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的重要法則。<sup>97</sup>以神靈思想作爲文學的「資料」

<sup>96</sup> 詳見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218-219。

<sup>97</sup> 設立於1795年的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便在學校大門上雕有兩尊女神雕像，分別象徵著文學與科學。1903年於上海徐家匯開辦的震旦學院，其《震旦學院章程》上的規劃，已可見「遵泰西國學功令，分文學Literature、質學（即科學）Science兩科」的設計。詳見《浙江潮》第6期（1903年8月），附錄。

(nature)<sup>98</sup>，離奇變幻為文學的「形式」(form)，從字面上看雖仍容易陷入中國神怪志異小說的聯想，但此定義不僅已論及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已帶出西方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的基本精神。整體看來，雖然意譯還不夠精確，但這條特別意義的文學意涵，已在傳統中國文章與經史子集之外，為國人開啓了西方文學的理解與詮釋的窗口，可提供給當時與未來的讀者與譯者進行嶄新的、現代性意義的文學思考與選擇。

第四層意涵可說更加限定，從原文解，“The profession of letters”是指以文字作為職業者，在西方自十八世紀中葉起，作家對於寫作這個行業已逐漸有高度的自覺意識。<sup>99</sup> 中文的譯解則是「文學業」，所謂「文學業」，指的是專把文學創作當作是一門職業而言。自晚清以來，透過翻譯西文作品以及報紙副刊的出版，都市裡確實已慢慢出現一群以翻譯或創作來謀生的職業作家，此定義在此時出現，某種程度上也頗能呼應並指稱彼時文學場域的現實。另就法文原文“belles lettres”來看，西方約在「十七世紀中葉，“literature”的意涵被確立，*belles lettres*（純文學）這個法文辭彙被發展出來，用以限制 literature 之範疇。」<sup>100</sup> 我們若對照中譯的「文藝」二字，極有可能這是在「文學」的現代概念普遍之前，用以限制「文學」意義的過渡辭彙，我們可在民初的大量文本中，看到「文藝」兩字的流行，且待日後詳考。

從傳教士到知識分子英漢辭典定義下的“literature”詞條，我們已可看到：一、隨著預期讀者的改變，解釋立場也隨之改變的事實；二、辭彙解釋也從單向釋義（用英文解釋中文）朝向雙向互解，英、美、中、日各種解釋匯通於一詞的狀況；三、更有辭彙家族的日趨完善，小從字根因字尾變化所帶來的不同詞性（如“literal”、“literary”、

<sup>98</sup> 譯成「本質」可能更容易把握。

<sup>99</sup> 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216。

<sup>100</sup> 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219。  
譯文中的“belles lettres”應作“belles lettres”，詳參見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8), 187.

“literate”、“literati”、“literature”），大至環繞新名詞、新術語所產生的觀念群組，如“literature”所衍生出來新的文類觀（從傳統的文、文字、文章、文墨到現代的文學）、政治觀（國家文學、斷代文學）、創作手法（寫實、虛構）、專業寫作的職業觀等豐富的內涵，無一不是朝向「專業術語學」的命名與定義而前進。

## 六、小結

本文透過梳理近代英華／華英字典的編纂來描繪學科新名詞朝向標準化、規範化的大致走向，並在此基礎上探索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主要以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作為考察對象，可知從187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尤其是上海租界等通商口岸）已興起了一股學習英語熱，並逐漸醞釀起要求新名詞、學科術語標準化的籲求。而英華／華英辭書的編纂，也透過1820年代以來由傳教士編纂英華／華英字典，以達瞭解中國，進而宣教的目的；慢慢轉為1870年代以降，以本國知識分子為編纂主體，廣大的中國閱眾為預設讀者，旨在學習外國語言與文化，邇在經商交易，遠在經世救國，力求現代知識能以科學而系統的方式譯介並輸入，以達中國之富強。而「文學」的現代意義便在此間發生。透過鄭其照廣採傳教士著作而成《華英字典集成》、謝洪賚本於馮鏡如新增羅氏字典而成的《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乃至顏惠慶對於《英漢大辭典》的譯介、出版與流傳，使得英、美、日、中各體系的辭書與教科書辭彙，同時納入《英漢大辭典》，而成「羣書總匯」、「具體而微之百科全書」。在“literature”詞條的考察裡，尤其可讓我們看出從西方傳教士到西方辭典編纂家的影響力。而“literature”慢慢在英華／華英、英和辭典中慢慢等同於「ぶんがく」、「文學」的過程，以及“literature”由最廣義到最狹義的分層展現，無一不是朝向現代化、標準化發展的重要面向。雖說《英漢大辭典》在編輯群能力受限的情況下，仍存有中英語彙定

---

義不對等或翻譯不夠精確的狀況，然而正是這樣的缺憾，可留待給未來讀者重新閱讀、解碼與詮釋，甚至孕育新辭典重編出版的動力。

（責任編輯：李冀）

## 徵引書目

-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等編：《中國的租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王雲五主持：《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6年。
- 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黨史研究室編寫：《老話上海法租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大清留美幼童》（紀錄片），北京：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出版年不詳。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商務印書館、小學館共同編輯：《日中辭書》，東京：小學館，2002年。
- 李爽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證》，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5年。
- 李爽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1期，2011年3月。
- 司徒：〈鄭其照與1868年《字典集成》初版〉，收於《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2012年。
- 汪家燊：〈商務印書館英語辭書出版簡史〉，收於陳應年、陳江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 沈國威：《六合叢談——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 沈國威編：《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周振鶴：〈英漢詞典與傳教士〉，收於黃秀如主編：《詞典的兩個世界》，臺北：網路與書，2002年。
- 周振鶴：〈《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在創製漢語新詞方面的作用〉，《詞庫建設通訊》第15期（1998年2月）。
- 馬長林：《上海的租界》，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製作：《漢語大詞典》〔電子資源〕，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
- 梁啓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 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永和：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73輯。
-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臺北：世界書局，1954年。
- 馮志偉：〈同義譯名研究芻議〉，《詞庫建設通訊》第16期，1998年5月。
- 曾紀澤：《曾紀澤集》，湖南：岳麓書社，2008年。
- 葛元煦：《滬遊雜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 費正清、劉廣京：〈第十一冊序言〉，收於費正清、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第11冊。
-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 鄒振環：〈19世紀下半期上海的「英語熱」與早期英語讀本及其影響〉，收於馬長林主編：《租界裡的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 鄒振環：〈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宮廷的英語讀本〉，收於《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 鄒振環：〈晚清翻譯出版史上的鄭其照〉，《東方翻譯》2011年第5期。



- 雍和明等：《中國辭典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
-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
- 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羅家倫主編：《浙江潮》，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據《浙江潮》第1-10期（清光緒29年（1903年）1-12月）複印，原刊爲日本東京浙江同鄉會印行。
-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國文化總論》，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
- 顧長聲：《馬禮遜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 （希）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著：《詩學箋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2年。
- （義）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
- （英）馬禮遜夫人（Eliza Morrison）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原著，張西平等主編：《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影印版），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 （英）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 Society*), 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 2003 年。
- (美) 劉禾 (Lydia H. Liu) 著, 宋偉杰等譯: 《跨語際實踐——文學, 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中國, 1900-1937)》, 北京: 三聯書店, 2002 年。
- (日) 井上哲次郎等: 《哲學字彙》, 東京: 東京大學三學部, 1879 年。
- (日) 內田慶市: 〈鄭其照の玄孫からのメール〉, 《或問》第 19 號, 2010 年 12 月。
- (日) 那須雅之: 〈第 1 期收錄書解説〉, 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 東京: 大空社, 1998 年, 卷 1。
- (日) 宮田和子: 《英華辭典の総和的研究——19 世紀を中心として》, 東京: 白帝社, 2010 年。
- (日) 鈴木貞美著, 王成譯: 《文學的概念》,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1 年。
- (日) 高田時雄: 《清末の英語學——鄭其照とその著作》, 《東方學》第 117 輯, 2009 年 1 月。
- (日) 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 《明治のことば辞典》, 東京: 東京堂出版, 1998 年 3 版。
- Hepburn, J. C. (平文先生) ed. *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和英語林集成》)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收於《明治期刊行物集成》, 東京: 雄松堂, 1988, 第 1 期, 文學、言語編。
- Kwong, Ki Chiu (鄭其照) 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華英字典集成》) Shanghai: Kelly & Walsh; London: Ludgate Hill; Hong Kong: Kelly & Walsh; San Francisco: Wing Fung, 1887. Open Library, 網址: <http://www.archive.org/stream/englishchinesedi00kwon#page/n13/mode/2up>. 檢索日期: 2012 年 8 月 20 日。
-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Lobscheid, W. (羅存德) 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英華字典》) Hongkong: Daily Press, 1866.

Lobscheid, W. 著，F. Kingsell 增訂：《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Yokohama：Kingsell & Co.，1897年，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9年，卷14-15。

Lobscheid, W. 著，井上哲次郎增訂：《訂增英華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Tokio：J. Fujimoto，1883年，收於《明治期刊行物集成》，東京：雄松堂，1988年，第1期，文學、言語編。

Lobscheid, W. 著；企英譯書館增訂：《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第2版，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9年，卷10-13。

Lobscheid, W. 著，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謙吉譯，中村敬字校正：《英華和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with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東京：山內輓出版，吉田橘翁印刷，1879年，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8年，卷1-6。

Lu, David J. “Missionary from Central Pennsylvania to Japan.”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址：<http://www.laijohn.com/Loas/Lou,KHi/article/Hepburn/2011.htm>，檢索日期：2012年9月5日。

Medhurst, W. H.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7-1848. Vol. II. Open Library, 網址：<http://www.archive.org/stream/englishandchine00medhgoog#page/n4/mode/2up>. 檢索日期：2012年8月18日。

---

Nuttall, P. Austin, ed.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86*. Rev. James Wood. London, New York: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914. Open Library, 網址：<http://www.archive.org/stream/nuttallsstandard00nuttrich#page/n7/mode/2up>. 檢索日期：2011年9月4日。

Porter, Noah.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pringfield, Mass: G. & C. Merriam Company, 1898. Open Library, 網址：<http://archive.org/stream/webstersinternat00port#page/n1/mode/2up>. 檢索日期：2012年3月14日。

## 附錄一：近代英華和辭典中“literature”詞條的演變

說明：本表所列辭書主要分為三大類：（一）傳教士所編辭書：如馬禮遜編《字典》、麥都思編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羅存德編《英華字典》、平文編《和英語林集成》；（二）日本知識分子所編譯的辭書：如津田仙等譯，中村敬字校正的《英華和譯字典》、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三）中國知識分子所編譯的辭書：如鄭其照編《華英字典集成》、Kingsell（馮鏡如）<sup>101</sup>編《新增華英字典》、謝洪賢等編《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顏惠慶等編《英華大辭典》。

辭書名稱 (中)	《華英字典》 第六卷	無中譯名	《英華字典》	《和英語林集成》	《英華和譯字典》	《訂增英華字典》	《華英字典集成》	《新增華英字典》	《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	《英華大辭典》
辭書名稱 (英)	<i>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I</i>	<i>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i>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i>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i>	<i>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with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i>	<i>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i>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i>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i>	<i>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i>	<i>An English-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i>

<sup>101</sup> 此辭典雖由 F. Kingsell（馮鏡如）掛名編輯，但實際編纂者卻是陳少白，詳正文討論。

編者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W. H. Medhurst 麥都思	W. Lobscheid 羅存德	J. C. Hepburn, A.M., D. 美國平文先生 編譯	W. Lobscheid 羅存德	W. Lobscheid 羅存德	Kwong Ki Chiu 鄺其照	W. Lobscheid 羅存德	羅存德氏	顏惠慶以編輯耳善 本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為底本進行 編譯
增訂						井上哲次郎		F. Kingsell (馮鏡如/ 陳少白)	企英譯書館 (謝洪賢)	顏惠慶等
譯者					津田仙、柳 澤信大、大 井謙吉					顏惠慶等
校正					中村敬字					
出版地	Macao, China	Shanghai	Hong Kong	英文封面 標記： Shanghai； 漢字封面標 記：日本橫 濱梓行 <sup>102</sup>	東京	Tokio 東京	Shanghai; London; Hong Kong; San Francisco	Yokohama 橫濱	上海	上海

102 《和英語林集成》的出版地出現了兩種標記，英文封面標記此書由上海美華書館印刷，但漢字封面則標記由日本橫濱梓行。此書的出版年為1867年，據周振鶴研究指出，「明治維新開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869年，上海美華書館的美國活版技師，把活版印刷術帶入日本，引發了日本的印刷及出版革命。」詳見周振鶴：〈英漢詞典與傳教士〉，收於黃秀如主編：《詞典的兩個世界》（臺北：網路叢書，2002年），頁34；另據能月之研究，負責美華書館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姜別利（William Gamble，1830-1886），於1869年應邀前往日本，傳播他所發明的電鍍中文字模，並助日本造漢字、英文、日文三種字模，幫助日本排印了一部兼用英日文的日英詞典後返回中國。詳氏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74。在一篇關於編者平文先生（James Curtis Hepburn）的生平介紹文章裡，也提到當年平文先生在編這部和英詞典時，因為日本還沒有出版社能夠進行英文排版，所以必須前往上海使這項工作完成。詳 Lu, David J. "Missionary from Central Pennsylvania to Japan"。網址：<http://www.laijohn.com/Loas/Lou.KHi/article/Hepburn/2011.htm>，檢索日期：2012年

出版社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The Mission Press (即墨海書館) <sup>103</sup>	The Daily Press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美華書館)	山內軾出版，吉田橋翁印刷	J. FUJIMOTO 藤井次右衛門	Kelly & Walsh (別發洋行)；Ludgate Hill; Kelly & Walsh; Wing Fung. 另在英文序言後註明由 Hong Kong "Tsun Wan Yat Po" 循環日報承印	Kingsell & Co.	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年代	1815-1823 (第二部英華辭典出版於1822年)	1847-1848	1866-1869	1867	明治十二年 (1879)	明治十六年 (1883)	光緒十九年 (1887) 第3版 (初版1868年、第2版1875年)	1897	1903 (第2版)	1908

9月5日。由此，日本的印刷術既然要等到1869年才由上海美華書館負責人前往日本傳播並指導，1867年《和英語林集成》的出版流程，極有可能是先在上海美華書館印刷，再運送至橫濱發行。

<sup>103</sup> 墨海書館 (原名應作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為倫敦傳教會在上海的出版機構，由該會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所創立。在麥都思1846年4月10日寫給倫敦傳教會總部的書信中，便提到正在採用由上海製成的活字進行《英華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以及《中國古籍》(Historical Classic of Ancient China) 的印刷工作，故 The Mission Press 所指即為墨海書館。詳見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10。

引用版本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	Open Library 線上版，只見 Vol. II。	1866-1869年 原版。	Tokyo: Toyo Bunko, 1970 年東洋文庫。複刻版。	東京：大空社，1998年。《近代英華·華英字典辭書集成》1-6。	東京：雄松堂，1988年。明治期刊行物集成。微縮資料。	Open Library 線上版，為1887年第3版。	東京：大空社，1998年。《近代英華·華英字典辭書集成》7-8。	東京：大空社，1999年。《近代英華·華英字典辭書集成》10-13。	1908年原版。
詞條 literature	學文。Fond of attacking(i. e. studying) ancient literature，好攻古文。(按：當動詞使用)	文字，文學，字墨； polite do. 文章； ancient do. 讀史，古文； learning，學文。	文，文學，文字，字墨；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今文。	Gakumon; bun; bund (按：即學文；文；文道)	n. 文，文學，文字，字墨，文章；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 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n. 文，文學，文字，字墨，文章；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 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文，文學，文字，字墨，文章；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 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n. 文，文學，文字，字墨，文章；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 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n. 文，文學，文字，字墨，文章；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 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n. 1. Acquaintance with books, 學識，學問，淹通，博學； 2. The collective body of literary productions of a country or an age, in general or in some special department, 文，書，文章，文庫，經史子集； 3. In a special sense, that body of literary compositions which, to the exclusion of merely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s, are occupied mainly with that which is spiritual in its nature and imaginative in its form, whether in the world of fact or the world of fiction, 文學，文章(特別意義，除哲理及科學外，凡神靈思想為其資料；離奇變幻為其形式，或實記或杜撰者，皆文學也)； 4. The profession of letters, 文學家； belles lettres, 文藝。





## 附錄二、《清議報》上的「華英字典出售」廣告

冊號	出版日期 (中曆)	出版日期 (西曆)	廣告位置	廣告內容	代售處
十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1899.4.1	卷末「告白」	馮君鏡如增訂華英字典，刊入英札指南，合計仟餘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玲瓏，了如指掌，欲從事西學者允宜家置一編也。舊印已悉數銷清，今再裝印多本出售，每部實洋六元，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館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并謹將代售處所列呈	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 神戶：致亨印書店。 香港：聚文閣書坊，文裕堂書坊。 ◎三地五家
二十二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1899.7.28	卷首「目錄」前	馮君鏡如增訂華英字典，加入英札指南，合計仟餘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玲瓏，了如指掌，欲從事西學者允宜家置一編也。舊印已悉數銷清，今再裝印多本出售，每部實洋六元，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館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并謹將代售處所列呈	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 神戶：致亨印書店。 香港：聚文閣書坊，文裕堂書坊，永勝街松利號。 ◎三地六家。

四十五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分	1900.5.19	卷首「目錄」前	<p>馮君鏡如增訂華英字典，加入英札指南，合計仟餘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玲瓏，了如指掌，欲從事西學者允宜家置一編也。舊印者已售罄，茲復再印多本，新式裝潢，比前精妙，擬自華歷五月初一起，每部取價銀六元五毫，照英洋加一計算，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館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茲將代售處列下</p> <p>◎再印多本，新式裝潢，漲價至銀六元五毫。</p>	<p>廣東省城：雙門底 聖教書樓，十八甫 石經堂。          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          神戶：致亨印書店。          香港：聚文閣書坊，文裕堂書坊，永勝街松利號。          ◎四地八家。中國有兩處。</p>
五十一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1900.7.17	卷首「目錄」前	同上	<p>廣東省城：雙門底 聖教書樓，十八甫 石經堂。          星加坡水仙門：德隆號。          上海：別發洋行。          舊金山正埠：聚昌榮。          香港：聚文閣書坊，文裕堂書坊，永勝街松利號。          神戶：致亨印書店。          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          ◎七地十一家，中國有三處。</p>

五十三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1900.8.5	卷首「目錄」前	同上	<p>廣東省城：雙門底 聖教書樓，十八甫 石經堂。</p> <p>香港：文武廟直街 文裕堂書坊，聚文閣書坊，永勝街 松利號。</p> <p>上海：別發洋行，二馬路 華彰洋廣雜貨號。</p> <p>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p> <p>星加坡：水仙門 德隆號。</p> <p>舊金山正埠：聚昌榮。</p> <p>◎六地十一家，中國有四處。</p>
五十四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1900.8.15	卷首「目錄」前	同上	<p>廣東省城：雙門底 聖教書樓，十八甫 石經堂。</p> <p>香港：文武廟直街 文裕堂書坊，聚文閣書坊，永勝街 松利號。</p> <p>上海：別發洋行，二馬路 華彰洋廣雜貨號。</p> <p>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p> <p>星加坡：水仙門 德隆號。</p> <p>檀香山：嚴觀詔先生。</p> <p>舊金山正埠：聚昌榮。</p> <p>◎七地十二家，中國有四處。</p>

七十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1901.2.19	卷首「目錄」前	馮君鏡如增訂華英字典，加入英札指南，合計仟餘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玲瓏，了如指掌，欲從事西學者允宜家置一編也。舊印者已售罄，茲復再印多本，新式裝潢，比前精妙，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館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茲將代售處列下	廣東省城：雙門底 聖教書樓，十八甫 石經堂。 香港：文武廟直街 文裕堂書坊，聚文閣書坊。 上海：別發洋行，二馬路 華彰洋廣雜貨號，北京路 美華書館。 橫濱：丸善書店，文經印書店。 星加坡：水仙門 德隆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正埠：聚昌榮。 ◎七地十二家，中國有五處。
八十一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1901.6.7	卷末，與多書售價合刊	本館發售及代售各書報價目 按：共列九本。其中「華英字典 全一冊六元」。	無
八十三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1901.6.26	卷末，與多書售價合刊	本館發售及代售各書報價目 按：共列十一本。其中「華英字典 全一冊六元五毫」。	無
九十六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1901.11.1	卷末，與多書售價合刊	本館發售及代售各書報價目 按：共列十二本。其中「華英字典 全一冊六元五毫」。	無